

论《京华烟云》的翻译性写作及其得失<sup>①</sup>

肖百容,张凯惠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林语堂《京华烟云》的写作过程是独特的,可以称其为“翻译性写作”,这一写作特征从小说中的人物名字与称谓、文化词汇与谚语、古典诗文引用等几个方面都能够得到印证。小说将中文里较具本土文化特色的信息资料和事件利用特有的表达方式展现给西方读者,使得文本在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基础上还能保留独特的中国文化意味。但是,林语堂还是无法完美逾越中西文化、语言间的差异,他对某些中国文化内蕴的表达还是有所缺失。

**关键词:**《京华烟云》;翻译性写作;名字与称谓;文化词汇与谚语;古典诗文;写作得失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6-0049-04

On the Translation Writing of *Moment in Peking* and Its Gains and Losses

XIAO Bairong ,ZHANG Kaihui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 The writing process of *Moment in Peking* by Lin Yutang is peculiar, which could be called “translation writing”. This writing feature is confirmed by the names and appellations of characters, culturally – loaded words and proverbs, and the quote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in the novel. Translation writing takes both usual practices in Chinese expression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of western readers into account. In this way, it enables the novel to not only correspond with western readers’reading habits, but also retain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Lin Yutang failed to coordinate the diversitie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anguages perfectly, which inevitably left deficiencies in the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mmanence.

**Key words:** *Moment in Peking*; translation writing; the names and appellations; culturally – loaded words and proverbs;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gains and losses in writing

《京华烟云》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文中引用的《京华烟云》中的文字,英文出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版林语堂《Moment in Peking》,中文出自现代教育出版社2005版张振玉翻译的林语堂《京华烟云》一书),它的奇特性表现在它的跨文化写作上。而这种跨文化写作和后来的华裔美国文学也不相同,它体现了东方半殖民地国家里作家的文化心态,也是林语堂所受中西文化教育的独特性的表现。林语堂于20世纪30年代用英语创作的这部小

说,以光绪26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30多年间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为经,以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的悲欢离合与恩怨情仇的故事为纬,既全景式地展现了时代风貌,也细腻地刻画出了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带着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学贯中西的林语堂,用英语创作出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轰动美国文坛,几十年来一直被欧美视作阐述东方文化的权威著述,而《京华烟云》作为其中的代表作,更因其“高超的艺术造诣和非凡

<sup>①</sup> 收稿日期:2010-07-25  
作者简介:肖百容(1970-),男,湖南邵阳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张凯惠(1987-),女,广西钦州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的文化修养,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时代》周刊称其“极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sup>[1]</sup>。

《时代》周刊是从西方读者的角度来评价《京华烟云》的,当然有其片面性和夸张的成分。但是这部小说确实值得关注,因为它不仅轰动了西方,在东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国内批评界对它的评价平平,甚至多否定之辞,或者干脆采取漠视态度。那么这部艺术水准尚有争议的小说在中西方拥有大量受众的根本原因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尽管从小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尽管在当了国文系教授时还不知道孟姜女哭倒长城和后羿射日的故事,<sup>[2]</sup>作为一位在中国出生,在福建漳州的青山绿水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与学者,林语堂的血脉里流动着的毕竟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即使其后来在国外定居多年,熟知外国语言与文化,也很难改变林语堂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行为和思维方式。进入老年后,林语堂经常谈论故乡的人事和坂仔的山水。他说坂仔的山水形成了他的“高地人生观”,他常以这种人生观而自豪。<sup>[3]</sup>其《京华烟云》,虽然叙述语言是英语,却无处不体现着中式文化与思想,流露出将中国文化翻译为英文的痕迹。同时,由于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这部作品是带着明确目的的,即向西方读者诠释中国文化以加强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小说在内容取材、人物刻画上都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涉及大量的传统文化信息。由此,主体的文化修养与客观上的叙述需要,都使得林语堂在著书过程中用英文描写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时,将那些以中文的形式闪过他脑海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词汇和场景,一一译介为英文。这成了他《京华烟云》的基本写作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林语堂的写作中,很大一部分是具有翻译性质的。而正是这些翻译痕迹使得《京华烟云》的写作过程成为一个翻译性写作过程,而不是纯粹的英文创作过程。

《京华烟云》翻译性写作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人物名字与称谓中的翻译痕迹。<sup>[4]</sup>《京华烟云》的翻译性写作首先体现在人物名字的设置上。小说开篇便出现众多人物,而这些人物的名字明显存在着翻译痕迹。如:Silverscreen(银屏), Bluehaze(青霞), Coral(珊瑚), Dimfragrance(暗香)等人名,

都不是英文中惯用的人名,而是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人名,容易让人联想到“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等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优美意境。可以想见,这样的名字绝非纯英语思维的写作者所会想到并采用的,而是林语堂以其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所创造出来,并将其用直译的方法转换为英文的。同样, Mulan(木兰), Mochow(莫愁), Mulien(目莲), Afei(阿非)等人名,也是作者预先以中文设置了的人名,因为这些名字都出自于中国古代典故与诗句。不同的是,针对这类名字,作者将其转换为英文时采用的策略是音译并诠释其由来,这样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其中的意义。

而同样显露出小说中翻译痕迹的,还有采用了音译法的各种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人称称谓,如: Laoyhe(老爷), Nainai(奶奶), Yatou(丫头), Hsiao chieh(小姐)等。这些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特定文化的称谓,是英语国家社会所没有的。作者需要通过翻译向西方读者传达这一文化现象。由于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这类称谓很难在英语中找到意义对等的词语来翻译,所以作者采用音译的方式,并在需要时加注解。这种方式就使得小说的创作过程具有了翻译性质。

2. 文化词汇与谚语中的翻译痕迹。其次,林语堂小说的翻译性写作也体现在对中国风俗文化的描写上。如: tsung tse(粽子), lapacho(腊八粥), Tsunghsi(冲喜), Menpao(门包儿)等都是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汇,其中涉及了中国民间传说、习俗,在与中国文化相异的英语语言文化系统里自然没有相对应的词汇。因此作者采用音译的方法,必要时在其后叙述相关的中国典故与风俗,以使西方读者不至迷惑,也顺便介绍了中国文化。而 serve tea(敬茶), wash the dust(洗尘), eight characters(八字), sweeping the grave(扫墓)等也明显是林语堂从中文直译过来的表达。因为此类表达也为中国文化体系所特有,作者不得不通过翻译来诠释。但在此类翻译中作者采用直译的方式,将英语的语言习惯与中文的表达方式相结合。这样的表达虽存有翻译痕迹,但也保留了一定的中国语言特色。

除此之外,小说中不少句子也毫无疑问地是对传统俗语和思想的直接译介。如:

A pox toad thinking of eating swan's flesh!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Be a monk for a day, strike the bell for a day.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When a family is in poverty it produces a filial son, and when a country is in danger it produces a patriot.

家贫出孝子,国乱识忠臣。

A boy grown big should marry and a girl grown big should wed.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这类中国民间谚语、俗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尤能表现中国人思想、行为的内在底蕴。林语堂在《京华烟云》写作中较多地穿插了这些俗话、谚语,借以生动细致地描画出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小说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翻译痕迹,构成一种翻译性写作。

3. 古典诗文引用中的翻译痕迹。此外,小说中对中国传统诗文的引用也明确显示出其翻译性特征。如小说每部分开头都有一段摘自庄子著作的引语,如第一部分引语:

To tao, the zenith is not high, nor the nadir low: nor point in time is long ago, nor by lapse of ages has it grown old.

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这段摘自《庄子·大宗师》的引语不仅在阐明小说所要宣扬的道家哲理精神,与小说主题紧密相关,同时也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种处世哲学,是林语堂旨在向西方读者所宣扬的人生态度<sup>[5]</sup>。遵循着这个目的,作者将艰深的哲理性古文用英语中常见的句式表达出来,以期将其意义传达给西方读者,这就有了从中文到英文的翻译转换过程。

又如,小说为了说明木兰儿子及弟弟的名字出处及意义时,特别引用了陶渊明的诗句:

Atung is only nine year old, He thinks only of pears and chestnuts.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以及:

I know today I am right and yesterday was all wrong.

觉今是而昨非。

摘自中国古代诗词的诗句在小说文本中多次出现,因为小说背景与中国古典文化密切关联,为了让西方读者能通晓其义并了解中国文化意蕴,很有必要将这些古典诗词用英语表现出来。这些比词汇和谚语的涵义更加丰富,在英语语言文化中更难找到相应的表达了。作者不得不采用纯粹语言的转换方式,亦即翻译。

这样一种翻译性写作方式在文学创作史上恐怕是少有的,因为它既不是纯粹的写作,也不是纯粹的翻译,而是二者的奇妙结合。《京华烟云》的成败得失基本来自于它的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

1. 《京华烟云》翻译性写作的贡献。由以上分析可见,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既是作者,也是译者,他的写作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翻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其实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翻译策略。作者在某些情况下突破了英语语言形式的束缚,充分考虑中文的表达习惯并顾及西方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将中文里较具本土文化特色的信息资料和事件利用特有的表达方式展现给西方读者。这就使文本在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基础上,还能保留独特的中国文化意味。

在小说中,人名的译介与说明体现了中国取名艺术中的文化意蕴;各种称谓的音译也保留了这个特点,可从中窥见中国社会等级制度的一隅;对中国特有的物品和风俗的翻译与诠释展示了市民日常生活的风貌与多样的民间习俗;对中国谚语、诗文的翻译更是道出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哲学思想。这些将中国文化最大限度地呈现给了西方读者,为当时对中国不太了解甚至于误解的西方读者打开了一道通往中国的大门。

总而言之,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通过音译、直译并在必要时加注等翻译方法,对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相关的人名、物品、风俗、谚语、诗文等诸多细节进行的翻译处理,以西方读者熟悉的语言体系将富于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化进行了译介,不仅获得了西方读者的青睐,也使中国读者感到亲切。《京华烟云》微妙地展现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色,向世界宣传了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与了解。

2. 《京华烟云》翻译性写作的缺失。由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而造成了种种障碍,译者的译介过程往往不仅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更需要对不同文

化进行转化处理。在《京华烟云》的著书过程中,林语堂虽有意地以翻译性的写作方式进行创作,但他还是无法完美地逾越文化、语言间的差异,对某些中国文化内蕴的表达仍然有所缺失。我们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京华烟云》中的姚思安是一位修养颇深的道家,他笃信道学,秉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处世态度。他的名字无疑蕴含着崇尚超脱,向往安然飘逸生活之意,是对其人生追求和精神理想的一种寄寓。可以说,这个名字是有助于读者解读姚思安这一形象的。但由于小说面向的是西方读者,是用英语进行写作的,因此中文人名必须通过翻译的形态呈现。在这种情况下,中文名字中的涵义如果不辅以解释往往很难通过直译或音译的英文表现出来。而在小说里,作者只是单纯把姚思安音译为 Yao Sze-an,并没有对其中意义加以诠释。这样,这个名字所隐含的意义在无形中缺失了,西方读者无从了解其个中内涵,他们对姚思安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也相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同样受此制约,让西方读者不能完全理解的还有体仁、怀瑜两个人物形象。体仁之名出自于“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含实行仁道之意;怀瑜一名出自于“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含品德高洁之意。然而二人的品行却跟名字中的寄意截然相反,于是名字构成了对人物的一种反讽,流露出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否定态度。但在小说中,体仁、怀瑜二人的名字根据读音译为 Tijen, Huaiyu,这对西方读者而言只能算是人称代号,读者无从体会其原有的反讽意味。

小说的翻译性写作在文化意蕴上的缺失还体现在对某些中国传统器物的翻译上。如在 Han tripod(汉鼎)这一翻译中,首先西方读者未必知道 Han 指的是一个朝代,另外,tripod 在英语里指用于支撑的三脚架,西方读者很难由该词联想到鼎这一物件,更不会了解鼎在中国文化中作为一种礼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代表着尊贵的文化内涵。因此, Han tripod 这一翻译只能译出形与字面意义,而无法

表现其文化内涵。再如 water tobacco pipe(水烟袋),西方读者同样只能依据字面知道这是一种用以吸烟的器具,而不解何为水烟,更无从知晓其历史渊源及其在中国社会市井文化中的意义。这些翻译性文字在语言转换过程中造成的文化缺失,要求译者选择恰当精准的表达或加注解,以使西方读者在阅读中不仅仅止于表面,而是能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内蕴。

受作者文化宣传意图的影响及小说自身取材的限制,《京华烟云》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翻译性写作的创作模式。深谙中西两种文化,并能熟练驾驭汉英两种文字的林语堂,以一种独特的、创作式的翻译方式,写成了一部极富文化意蕴的作品。他采用这一策略来处理小说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成分,将其表述得生动有趣,将中国文化再现在西方语言中,使西方读者体验到了中国情调,这是值得肯定与借鉴的。同时,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缺失,也值得我们思考。如何精准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促进西方读者深层次地领会和理解中国文化的意蕴,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 参考文献:

- [1] 林太乙. 前言[M]//林语堂. Moment in Peking.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3-20.
- [2] 林语堂. 乡村的基督教[M]//林语堂名著全集:10.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0-14.
- [3] 林语堂. 少之时[M]//林语堂名著全集:10.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9.
- [4] 夏冬星. 论《京华烟云》人物的取名艺术[J]. 时代人物,2008(3):216.
- [5] 肖百容. 林语堂快乐哲学初探[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44-49.

责任编辑:黄声波